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丛书

美利坚独步天下

美国是如何获得和动用它的世界优势的

[美] 韩德 著

马荣久 牛悦 孙力舟 杨光 译 牛军 校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丛书



美利坚独步天下

美国是如何获得和动用它的世界优势的

[美] 韩德 著

马荣久 牛悦 孙力舟 杨光 译 牛军 校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利坚独步天下:美国是如何获得和动用它的世界优势的/(美)韩德(Hunt, M. H.)著;马荣久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丛书)

书名原文:The American Ascendancy: How the United States Gained and Wielded Global Dominance
ISBN 978-7-208-10097-8

I. ①美… II. ①韩… ②马… III. ①外交-研究-美国 IV. ①D8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38766 号

责任编辑 韩梅梅

封面装帧 王小阳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项目

美利坚独步天下

——美国是如何获得和动用它的世界优势的

[美]韩 德 著

马荣久 牛 悦 译

孙力舟 杨 光

牛 军 校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5.25 插页 4 字数 357,000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0097-8/D·1922

定价 52.00 元

**The American Ascendancy: How the United States
Gained and Wielded Global Dominance
By Michael H. Hunt**

Copyright © 2007 by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1 by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Chapel Hill,
North Carolina 27514, www.uncpress.unc.edu
All Rights Reserved.

丛书总序

纵谙古今韬略 横务天下经纶

自战国至秦汉以来，中国就不乏“纵横家”，即当代所称的战略家。他们多为君王的策士，胸怀大局，熟谙兵法，满腹经纶，长于韬略，果断决策，机智善辩，纵横捭阖。《战国策》、《孙子兵法》等许多经典著作，记录了中国古代丰富的战略思想。现代中国战略家当中，毛泽东的雄才大略和军事思想，至今无出其右者。

西方古代的战略思想源于古希腊、古罗马。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不朽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与《孙子兵法》诞生于同一历史时期。近代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对后来的军事战略思想（包括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普鲁士德国政治家俾斯麦的外交战略为后人所仰慕称道。

直到冷战时期，国际战略及该领域的研究，还基本上限定于传统的国家安全战略领域，特别是国防战略、军事战略和着眼于结盟与反结盟的外交战略。此前，罗斯福领导下的美国设计了以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为框架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其实就是一种美国至今仍在执行的试图维护霸权的“大战略”（Grand Strategy），只不过当时还没有做这种界定。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的主要内容则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战略的延伸，即区分敌我友，分析国际形势和力量对比，运用国际资源打击主要敌手，维护国家安全。

科学技术改变了人类命运，国家之间相互隔绝、按照军事强权划分势力范围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全球化大大丰富了国际战略及其研究的外延与内涵。军事战略仍然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而传统国

家安全也仍然是国家对外战略的重要考虑。但是,随着世界大战阴霾的消散,大国之间大规模战争危险的降低,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的加深,经济竞争加剧了,全球范围的贫富悬殊扩大了,能源、生态环境、气候变化、公共卫生、跨国犯罪、恐怖主义、宗教冲突等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问题突出。离开对上述关乎国计民生的功能性、全球性、跨国界问题的研究,今天的国际战略研究就会变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对于坚持改革开放的中国来说,国际战略必须同国家发展战略一起谋划,同步执行。

但是,对具体问题包括公共政策问题的研究,决不能取代国际战略研究。应当看到,全球化越向社会纵深发展,国家利益越多元化,内外政策互动越紧密,形成“大战略”的迫切性就越突出。一个国家的国际战略历来是由其最高决策者来制定的。但是,同过去“伟人时代”不同的是,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和地方部门在参与国际战略的制定,而任何一个部门都有其视角上的局限性。

战略需要综合分析、全局观念、长远谋划、协调执行,也需要深厚的研究基础。对于研究国际战略的学者来说,我们施展才学的舞台越来越宽阔,但知识面的局限性也越来越明显。一方面,古今中外的纵向韬略经纶需要认真学习和总结;另一方面,层出不穷的全球横向新问题有待研究。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旨在促进国际战略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其重点是对当今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以及相关各国的国际战略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公开发表或向有关方面提交有政策含义的、面向未来的研究成果。我们的研究工作致力于中国的国际战略决策提供智力支持,为教学服务,并引导公众全面、准确、理性地认识国家安全与国际战略问题。我们鼓励跨学科、多重视角的研究课题,力图实现理论和方法论的创新。本丛书将本着开放、包容、谦虚、严谨的学风,寻觅国际战略领域的精品。尚拜求海内外志同道合者,惠赐宏论巨制。

王缉思

2008年新春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译者前言

《美利坚独步天下》是美国著名外交史学者韩德(Michael H. Hunt)的又一部力作。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史、中外关系史和美国外交的中国学者来说,韩德教授并不陌生,有些可能同他还很熟悉。这部分地是因为他同中国学术界的长期交往,当然更主要的是他的著述引人注目,其中已经有两本被翻译成中文。一本是《一种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前的美国与中国》(*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o 1914*),另一本是《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Ideology and U. S. Foreign Policy*)。两本书能在中国翻译出版有不少学术上的理由,其中的共同点是两本书不仅反映出著者的学术造诣,而且具有其独特的角度。前一本书被评论为跳出了美国前辈学者的经典著作的框框,“破成说,立己见,走出了自己的路子”¹。这种评论同该书在美国获奖的原因是一样的。后一本书被认为是“里程碑式的著作”,“是美国史学界第一部系统研究美国外交史上意识形态影响的著作”。²

可以说,选择将《美利坚独步天下》翻译成中文,也是基于以上同样的理由。这本书是美国史学界第一部从全球史的视角研究美国对外关系史的著作。正如作者在中文版序言中所说的,该书结合了文化史、国际关系史和全球史三个研究视角和方法,其中主要的还是全球史,因为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需要有新的视野,需要超越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框架,重视跨学科的和比较的研究。韩德教授已经在中文版序言中概要地介绍和解释了这本书的分析框架和主要思路,在此不赘述了。对中国读者来说,重要的是该书的价值,它们大致反映在两个层面。首先是展现了一种从新的、更宽阔的视角去认识和理解美国对外关系的历史;其次是在此基础上再次提出了到底应该如何了解和认识美国的问题。

关于第一个层面,该书展示的美国对外关系历史画面是丰富多彩的,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从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美国获得世界优势地位的历史过程;美国获得世界优势地位的国内基本条件,如高速增长的经济、强大的军队、强势的政府和富有智慧及远见的国家领导人;美国世界地位的重要且独特的表现是在国内形成的极富吸引力的消费生活方式和极具传播力的美国文化,尤其重要的是它们已经与当今全球社会几乎融为一体,等等。该书将不同阶段上出现的影响美国对外关系的各种因素都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将它们同世界上同时发生的各种历史进程联系在一起并进行比较。与以往有关的论著多将重点放在国家战略、对外政策和决策分析等方面大为不同,该书在展示美国崛起和对外关系发展的过程时,特别关注美国经济蓬勃发展、科学技术大幅进步、消费生活方式和社会文化思想等等对美国世界地位的形成以及对全球化造成的影响,这是本书的一个主要特点。对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动用其世界优势地位所带来的问题,即过度干预国际事务和继续膨胀的雄心壮志给美国在世界上造成的损害以及对国内各个方面带来的消极后果等等,该书做了详细和深入的分析,并据此提出美国公众应该思考,美国是否有必要为了价值、信仰以及由此产生的历史冲动等,便如此之积极和不仔细权衡代价地动用其优势地位,以致造成今日看上去对美国来说是很不确定的麻烦局面。毫无疑问,这本书有助于大大地扩展认识美国对外关系史的眼界。

关于第二个层面,该书的结构和宏大叙事是富有启发的,它跳出了以往外交史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叙事窠臼,在全球史的框架下观察和叙述美国对外关系史。这种叙事的结果之一是凸显并进一步强化这样的观点,即不能简单地将美国视为一个民族国家,即使只是为了认识美国的对外政策也是如此。从全球史的视角观察,毋宁说美国同时也代表了或者说就是一种新的文明,就是全球化中的一个过程。当然这并不是完全否认美国是一个民族国家,但它的确因为对全球化影响过于强大而变得很独特。在当今影响世界的主要事件、各种国际事务中的主要规范,乃至世界各国人民生活方式的很多方面,几乎都打上了“美国”的烙印。此前从未有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如此深入和广泛地同世

界各个部分联系在一起,以及通过自己在各个领域的努力和成就,如此强有力地将世界各国紧密联系在一起。世界上凡是将现代化作为追求目标的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如果能从全球史的角度界定美国的历史地位,审视本国同美国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制定较为持久的政策,这与只是从“霸权兴衰”、“大国博弈”出发的思考相比,肯定会更丰富、更深入,且获益更多。

本书第八章的最后一段是这样结束的:“美国统治下的秩序会是脆弱和短暂的,还是坚固而持久的?美利坚民族和世界其他民族会在美国的主持下越发繁荣,还是会在日益增加的国家之间的猜疑、地区内部的怨恨和全球性问题的重压下衰退?在令人不安的世界潮流带着他们不喜欢的答案与他们发生冲突之前,身处历史上最强大的共和国的公民们应该反思这些问题。”看过本书后,读者其实也不妨这样提问:世界的其他部分是否考虑过并准备好应付美国不再动用或不再拥有其优势地位的局面,尽管这在短期不大可能发生。

本书的第一、二章由孙力舟翻译,第三、四章由马荣久翻译,第五、六、七章由杨光翻译,第八章及结语由牛悦翻译。中文版序言是李晨翻译的。另樊超、孙明霞、黄佳宁、赵东昉等给予了很多帮助,在此说明并表示感谢。由于水平有限,翻译中难免有偏差之处,烦请读者见谅。最后,希望本书对学习和希望了解美国对外关系史以及理解全球化进程中的美国的读者们有所助益。

牛 军

2011年2月15日

注释

1. 韩德:《一种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前的美国与中国》,项立岭、林勇军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丛书主编前言》,第1页。

2. 迈克尔·H.亨特(韩德):《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褚律元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

中文版序言¹

我向来觉得将酝酿成型的思想写成书并非难事。随着好奇心得到满足，我通常会急于转向新的挑战。然而，撰写《美利坚独步天下》却是个例外，因为这本书涉及很多重大的问题，需要持续地关注。中文版序言反映了我对本书的总结和一些新的思索，希望能对中国读者有所帮助。

我着手写这本书时，美国外交政策正漂泊不定，亟须新颖的历史解读。我的想法是把历史学界近来流行的几种研究方法如文化史、国际史和全球史等结合起来，这有助于重新界定当前的问题。全球史对我的思考影响最大。这个相对较新的历史研究领域点出了跨学科的重要性，并提倡超越民族国家窠臼的、在比较范式中的思考。我想象本书的读者不仅包括学生与一般公众，还有那些平时不接触历史学领域的决策者和评论家们。

《美利坚独步天下》按编年体论述美国对外关系的发展。开篇强调的是影响深远的19世纪。在这一时期，美国经济动力十足，增长速度前所未有，因此在20世纪初期形成了繁荣的消费社会，它不仅成为一种模式，也成为一种独具影响的国际力量。与此同时，经济上取得的成就也促进了现代美利坚国家的形成，使之拥有强大的陆海军以及其他外交工具。这些发展既激发了美国参与国际事务的抱负，也带来了麻烦，后者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咎于19世纪。到19世纪90年代，通过在北美大陆的扩张，美国在运用权力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并用于海外，先是中美洲、加勒比海、亚太地区，然后是欧洲。

对于20世纪中叶美国世界地位的转型而言，蓬勃发展的经济与各种各样重要且大量成功的传统治国之道等，都是不可或缺的。世界大战不仅给美国带来了重建西欧与日本的机会，也带来了建立国际秩序

的良机。华盛顿建立的国际组织以及倡导的国际规范给 19 世纪后期开始的全球化注入了新的生机。同时,华盛顿全力讨伐“专制主义”。这些斗争改变了美国的战略思想,造成了全球性的投入,并且发展了捍卫全球性投入的高技术军事力量。最后,20 世纪中叶,美国的政治与军事力量延伸到正处在去殖民化与革命躁动中的每一个地区。华盛顿继续有效控制着拉美,并且扩大了在东亚的存在,同时在中东稳步地将自己的义务和被保护者结合起来。

美国在 20 世纪中叶一系列的举动所产生的后果是本书最后几章的内容。重要的是从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开始,美国进一步膨胀的雄心壮志和影响却造成始料未及并且有时是破坏性的后果。美国对于遍布全球的跟班们承担义务,促成了错误的对外干涉,导致国内的深刻分裂,并且在美国公然干涉的地区激起了敌意。越南战争是这种不利趋势的最初和令人担忧的例子。由于限制了美国决策者的行动自由,那些原本受到重视的国际组织与规范被丢到一旁。对外战争与全球化的双重影响引发诸多国内问题——从社会不公到财政开支激增,到忽视公益和怀疑政府公信力,到所谓“帝王式”总统制的兴起,它改变了经长期树立起来的美国宪政格局。

以上是关于美国权力的长期动态的叙述与分析,我没什么要改动的。而且到目前为止对本书的评论都是积极的,这也说明学界同仁给予了一致的肯定。但是我并不满意。自 2006 年中期我向出版社交出定稿以来,书中指出的问题依然存在,甚至进一步恶化。严肃讨论这些问题的可能性在降低,政策圈继续在过时且浅薄的历史观中徒费口舌。

在以往的框架中形成的观念根深蒂固,阻碍着对美国外交的新思考。这种含混的主流观念坚持认为,20 世纪 40 年代才是美国外交的开端。美国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揭开了新时代的序幕;冷战初期的外交决策很快确定了新的方向。随着欧洲的衰落、其殖民地处于动荡之中、专制国家大举扩张、国际经济处于瘫痪等,美国已经别无选择。美国人必须警醒,意识到来自全球的压力,并承担起无法避免的艰巨责任。照那种老套的说法,美国“孤立”得太久了,以致对已经降临的考验措手不及。一位当时颇受公众欢迎的人物说,美国就像个孩子,必须迅

速成熟以适应成人社会。必须改变这个国家几十年来形成的懒散和浅尝辄止的习惯,离开舒适安全的“巢穴”,对抗来自各方的威胁。这个主流观念提出,正是从这种种扭曲的经历中产生了一种娴熟应对国际事务以及战争的全新方式,它号称“国际主义”。

这个“年幼的国家迅速成长”的故事有点神话的性质,其主旨体现了孤立主义的危险和国际主义的美好。它无视或者歪曲美国与世界持续长久、范围宽广和多样性的联系。它成为对外干涉普遍受欢迎的理由和打击质疑者的大棒,那些干涉代价高昂而且是成倍增长的。面对近几十年来持续增多的政策困难,正统派们反而更加拥抱那种慰藉人心的陈旧观念,并用苏东解体、美国领导的全球新秩序崛起以及当前的全球反恐战等来证明,美国仍然走在“天定”之历史轨道上。他们对今天大多数美国外交史家的看法充耳不闻,因为史家们都不接受美国政策是突然转向的这种僵硬而简单的论述;他们对面前飞舞的所有资料视而不见;他们背对关于美国政策中那些核心问题的争论,继续抵制从更新更宽广的视角来理解美国的世界地位。

当政策圈的评论和分析继续坚持这种过时和狭隘的历史观,并无视那些对重构美国对外关系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新见解时,我们该怎么办呢?在本书中采用反叙述事(counter-narrative)可能是不够的。我开始意识到,为了取代一种漏洞百出的历史叙述,必须矛头直指那种叙述赖以展开的核心概念。在过去几年的一些著述中,我一直在考虑如何直击要害。三个概念已经清晰浮现。

在本书中,论述最充分的概念是霸权及与之密切联系的全球化。现在对这两个概念通行的诠释都存在问题。全球化经常被错误地看作是一个当下的现象,而非一种至少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进程。此外,全球化还被局限于国家这个狭隘的窠臼中,忽略了它与技术、经济、社会及文化等诸多领域的关系。霸权作为全球化之一部分,其含义经常游移不定。有时与帝国混淆,有时又被认为是任何强权国家都有的特征。

一个准确的、以历史为基础的美国霸权这个概念应该有四个特性。首先,应该突出过去150年来全球化迅猛发展与美国霸权同样急剧膨

胀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美国乘着蓬勃兴起的贸易、资本流动及劳动力迁徙的浪潮在国际上异军突起。全球化早期提供的机会使广泛多样的影响与霸权结合起来成为可能。在 20 世纪的头三十年,美国的经济和文化影响力已开始改造社会并重塑世界各地的日常生活。当 1945 年后美国发起、设计和规范的国际体系形成时,这种趋势加速了。在全球化的每个阶段上,都有使美国霸权成为史上独一无二的事情在发展。通过比较研究可以发现,没有任何国家像美国一样,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如此之大的影响。最明显接近的可比者是 19 世纪的英国,它的影响范围受到了决定性限制,包括存在几乎与之不相上下的竞争者、相对简陋的信息传播和运输技术、相对而言小级别的经济。简言之,美国霸权史无前例。

美国霸权的第二个特性是它的基础广泛。它包括对政治和军事力量的运用,但更重要的是美国的经济、文化和产品等都渗透到了世界各地,还有有意识地促进跨国组织和国际规范。到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广受世人关注的社会与经济发 展的样板、世界工业与金融的发动机、国际议程的推动者。这些议程的目的是推进全球一体化、防止冲突或者至少限制它的破坏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塑造世界的可能性更大了。从那时开启的“美国世纪”这个提法,就蕴含着按照美国立场重塑世界各个方面的意味。

第三个特征是合法性。倘若无法获得对价值和体现这些价值的国际制度的尊重,以及对国际制度所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包括秩序、繁荣和正义——的尊重,那么霸权的建立和维持就算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也会是非常困难的。合法性是不能被强加和伪造的。至少到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还是能极大地满足合法性的需求。此后,它却对于很多新出现的全球问题视而不见,包括收入不均、环境恶化、核扩散、饥饿和疾病传播等,这些通常都削弱了自身的合法性。同时,因为蔑视美国早先支持的诸如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和诸如人权这样的规范,美国的信誉也被削弱,并且受到公开的反 对。

最后,霸权的生存还是依赖于对其国内基础的掌管。不能提供公平的国民福利的国内体制会削弱霸权。美国国内的很多发展趋势正在

削弱美国作为榜样所受到的普遍的国际尊重,以及削弱作为能提供各种产品、服务和观念的体制的竞争力。很多方面都存在着极其严重的问题:基础教育毫无起色、通信以及基础设施老化、社会焦虑以及政治不信任、国民福利偏低、广泛参与的意义深远且受尊重的民主体制在衰退。

用更准确的方式思考霸权也带来了一系列难题。美国是全力振兴其国际领导地位,还是干脆放弃这种追求呢?如果要恢复领导地位的话,需要付出多少?能够收获多少?需要国内做出何种调整?如果选择放弃,那么美国今后又根据什么准则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美国放弃霸权会对全球化进程和其他国家的利益产生何种影响?

帝国是需要从历史角度澄清的第二个概念。在本书的结论中,我过于强调霸权与帝国的区别,却没有对美国的地区政策中所具有的帝国特性给予足够的重视。另外,我也没有直接讨论流行的政治评论中对帝国这个老话题的拒绝和否认。帝国被想象成只是和其他国家有关的事情,对美国没有任何重要意义。

这种“美国特殊论”完全不能接受,让我们从最原始概念开始,看看能从关于帝国的大量丰富的历史研究中吸取什么。基本的和描述性的定义是,帝国是中央直接控制的政治形态,它采用强制手段(包含暴力或者威胁使用暴力)来征服一块特定的领土。帝国建立后,就会有其他结构性特点。维护帝国需要宗主国与殖民地精英阶层(它对当地有很大影响)的合作,以及其他一些机制,如前沿的军事基地、帝国的行政管理阶层、能合理化国内和国外统治的正统意识形态等。

那些质疑者的反对意见不是基于对历史的理解,而是深植于他们信念中的“美国例外”。一些人想说,间接控制是美国的一个显著特征,这和帝国不一样。这经不起推敲。罗马对东部边疆和古代中国对帝国直接威权之外地区的管辖等都是间接控制。还有人认为,帝国就是剥削,而美国的控制则是由善意引导的。这里的问题是这些人刻意简化了帝国的定义,以使他们能够把这个标签贴给其他国家,同时让美国置身事外。

在此,我们不打算关注直接和间接控制的区别或动机好坏的区别,

而是关注在帝国的资源、某一时期的技术水平、被统治者的忍耐程度等因素限制下,如何行使控制。即使是直接控制,也经常需要通过让步来换取被统治者的参与和支持,以提高统治的可行性和效率。与其验证直接还是间接控制、是善意还是恶意等,还不如提出一些问题:谁最终决定当地统治者的去留?谁能在结盟与外国军事基地问题上做出决定决策?本地军队听谁的?

用这些功能来检验,美国长期以来就是一个被多种形式伪装起来的帝国。美国起初是一个大陆帝国(在国家独立时已有的移民殖民地的一种形态);在19世纪末又成为了一个正式拥有海外殖民地的帝国;此后,又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大部分地区、东亚沿海地区以及西亚的一些仆从国等施行间接帝国统治;这种统治在冷战初期甚至到达了西欧。在帝国的每个阶段,美国都为其扩张找到所谓义不容辞的理由(“天定命运论”、门罗主义、遏制政策、反恐战争)。它与顺从的当地精英进行合作,建立起依靠美国支持的军队。它还建构起由军事基地和同盟组成的强大网络,并且派遣总督来扶持和领导当地的附庸政权。如果这些措施都失败了,美国会派出远征军,或采取秘密行动来变更政权。这一历史悠久而且内容丰富的记录显示,帝国对美国而言不仅一点都不陌生,甚至已经铭刻在美国的国家基因中。

这个帝国的怪异之处是相当一部分公民一再对帝国表示厌倦和反感。这种敌对情绪的历史渊源是那些受到古典教育的美国早期领导人坚信,帝国对共和国的生存构成了根本性的威胁。这种信念引起了19世纪40年代和1898年之后有关领土扩张的激烈争论。对于共和制的脆弱性的担心在整个20世纪中延续,而且间或地仍然能在当下的政治评论中听到。

反帝国情绪的第二个渊源是20世纪兴起的“消费共和国”。消费者—公民认为帝国荣耀并不重要,且投票结果也清楚地表明,他们不愿意为遥远且肮脏的战争做出个人牺牲。最后,美国人对帝国的怀疑也源自国家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被战时宣传极度强化。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华盛顿一直要在自己支持民族解放和敌对帝国的压迫之间,画出一道清楚的界线。

在对共和体制的担忧、内向的消费主义伦理和对民族自决的道义支持等共同作用下,美国不仅是一个怪异的帝国,而且可以说有些自欺欺人、低效和迷惘。更糟的是,美国对民族自决和非殖民化的支持,也使国外产生了一种期待,即推翻美国领导人要获得的有力控制。从国外的角度看,美国的立场是自相矛盾的,它在支持民族自决的同时又在很多地方违背这个原则,这种违背不仅现在发生,而且是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如此。在后帝国时代,反对帝国的人民又试图为一个“自由帝国”辩护并管理它,这导致了困扰美国政策的一些问题。

由此可见,对美国而言,帝国先于霸权出现,而且与之存在基本的冲突。胁迫其他民族是一种耻辱,有可能造成巨大的破坏,而且一旦反复为之而成为常态,就会给霸权的合法性造成危机。国际民意调查很清楚地显示了美国的帝国政策如何在国际社会引发广泛的反感,这种反感毒化了对于美国社会、文化和对外政策的态度。在中东,帝国与霸权之间的不兼容关系表现得最为明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领导人就开始在中东构建一种非正式的控制范围。近年来,由于这种控制在该地区内受到抵制,美国开始用霸权目标来为帝国辩护,包括追求民主、稳定、自由市场、恐怖主义国家与人权等等。在此过程中,对美国的怀疑进一步加深,美国决策者陷入混乱,公众也愈加困惑。

民族主义是可能动摇常识看法的第三个概念。历史分析在这里强调的是国家认同如何在全世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此进程中,美国人民同其他人民一样深受影响。民族主义理论家们通过广泛的案例研究告诉我们,民族主义决不是自然的、与生俱来并永恒存在的东西。相反,它是一种包含着很多矛盾、需要面对挑战并且必然会变化的社会建构。对于民族主义的思考不仅要重视主导它的价值,也要注意这些价值之间的相互冲突。毫不惊奇,美国民族主义展示了过去的重大转变,期间也伴随着与既有的和新兴的价值之间产生的激烈争论。为了简洁,我们聚焦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那时就同时存在两种不同的主流民族主义理念。它们现在依然与我们相伴。

一种是消费民族主义。消费主义的动力来自于19世纪晚期出现的大规模生产和消费的体系。它成熟时便伸展出一种令人神往的愿

景：它可以让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家庭世代都更富裕。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到 60 年代，对很多人而言，这种梦想确实变成了现实；日常生活越来越被认为是增加琳琅满目的消费品和服务的过程。在这个消费国家，个人满足变成当务之急，而公共事业只能叨陪末座。

与人见人爱的消费生活方式同时兴起的，是美国领导人驯化和变革危险世界的更为英雄主义的信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初期国际形势的冲击下，外交决策部门决定推行新政策。它的标志是建立了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和同盟体系，推广民主和自由贸易，以及实行了帝王式的总统制。它为那个全球梦想广泛聚集更多的资源。到 20 世纪 50 年代，公众虽不至于热烈拥护，但已经习惯和接受了这一新安排。那些自不量力去挑战它的人都被忽视、边缘化，有时遭受排挤和打击。

到 70 年代，这种盛极一时的民族主义已经开始陷入困境。经济低速增长、收入差距扩大、去工业化给工薪阶层带来的冲击等，都威胁着消费共和国。起初作为消费引擎和提升繁荣的债务失控了。消费者依靠借债来保持他们的梦想，这靠他们停滞不前甚至已经开始下滑的收入是无法实现的；联邦政府宁可举债也不增税和激怒消费者；由于对进口消费品的需求远大于出口产品的数量，国家经济中堆积着国外负债。

担当世界领袖的义务遇到同样严峻的挑战。有关越南战争的争论第一次引起了对美国担当全球改革者和国际警察的质疑。另外，美元贬值以及其他经济强国的崛起不仅造成了对美国政策的限制，并且使美国的优势受到质疑。为了走出越南战争失败阴影并显示美国持续强大的领导力，让美国尚存的相对优势都发挥出来，决策层越来越重视军事力量。使用美国的军事优势才能保持美国继续是“不可或缺的国家”。

军事化反过来在两种民族主义思潮之间造成了矛盾的关系。消费共和国的公民们非常抵触服兵役，而且对代价高昂并且旷日持久的海外干涉极其不满。如同早年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那样，近年来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让美国民众心神不宁。虽然厌倦战争，消费者们还是能通过与合作得到心理满足。后者的勇气和牺牲使这个一心赚钱和花钱的国家显得高尚一些。

尽管冷战早期开始的对消费主义和全球领导地位的信念从 20 世